

人民日报关注央行近3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GDP和CPI温和下降 “预调微调”窗口开启

11月30日晚,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12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近3年来首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表明在基调不变的前提下,货币政策正根据形势的发展,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在分析经济形势时表示,当前经济内生力增强,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新特点,宏观经济政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的时机已经成熟。

预调微调的窗口开启

物价拐点显现。今年以来,中央反复强调,稳定物价总水平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目前来看,物价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政策效果渐显。8、9、10三个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分别达到6.2%、6.1%和5.5%,同7月份创37个月来新高的6.5%相比,出现了较明显的回落,物价拐点特征明显。

楼市调控效果初显。国务院多次发文要求,坚持和强化楼市调控,在增加住房供应的同时,对不合理的住房需求进行了抑制。两年来的楼市调控政策始终保持高压态势,终于使楼市开始出现量价齐跌的苗头。

国家统计局11月份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环比下降0.14%,首次出现环比下降。

对此,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高企的

房价不仅加速积聚资本,还形成新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楼市调控不能放松。

经济增速放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前三季度经济数据表明,GDP一、二、三季度同比分别增长9.7%、9.5%、9.1%。反映经济增长变化趋势的先行指标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反映了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趋势。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公布的11月份PMI从上月50.4%下降至49%,自2009年3月以来首次回落到50%的景气临界点以下。

中金公司研究报告认为,当前经济增长趋稳是主动调控的结果。经济增长比较稳健,基本与我国的潜在增长率相一致;四季度经济增速受疲弱的外部需求影响,将会进一步降低。

卢中原认为,GDP增速和CPI涨幅双双温和下降,为宏观经济适时适度预调微调创造了条件,预调微调的窗口开启。

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措施相继推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在基调不变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开始预调微调,央行将在稳健货币政策的框架下,做一些阶段性、结构性的放松。此次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正是体现了这样的信号。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基调不变的条件下,也在微调。首先是增值税改革试点,意在结构性减税。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2年1月1日起,在部分地区和行业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逐步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其次是地方债试点。

预调微调是针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的一些必要的政策调整。卢中原认为,今年我国经济增速仍将在9%以上,对于“硬着陆”的担心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未来物价走势仍有不确定性,物价稳定的基础还不牢固。宏观调控基本取向暂不需要大的调整。卢中原说,我国经济增长正处于短期回调状态,仍在正常范围内。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可以考虑保持基调不变,但应进一步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相互协同。

据人民日报

对话

惠双民:“二次探底”不会出现



惠双民
国家行政学院
经济
教研部教授

现代快报:在你看来,GDP增速和CPI涨幅双双温和下降,反映了怎样的核心事实?

惠双民:GDP增速的温和下降,反映了这一轮国际经济大的调整。

中国经济自2008年以来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今年开始,随着政府积极性财政政策的退出,市场真实的经济增长的情况开始显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政府退出的时候,GDP并没有出现大的跌落。从市场层面来说,中国经济还是比较好的,微观面还是很积极的。增长理性地回到了市场本身,而不再是政府一种积极的干预的冲击。中国经济不会出现一些人所担忧的那样,出现二次探底。

CPI涨幅的下降,一方面,从宏观调控来说,与紧缩的货币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CPI的回落,与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大宗商品的进口成本下降有关系。政府退出之后,供给没有出现大的下降,CPI正常地回归了。

现代快报:下一步要使经济更好地运行,必须做好哪些工作?

惠双民:下一步要让市场恢复它自身的运行,还是要放开行政的干预。以前出现过“非公36条”,那么我的建议是,这次要形成“非公金融36条”。我们以前是在产业领域放开,我认为这次要在金融领域向民资放开、向市场放开。只有把金融领域放开,才能支持产业的放开。这样才能真正让中国实现第二次的市场经济的深化。前期的深化主要在产业领域,在金融领域深化后,才会真正实现全面的、充分的市场化,这样才能保持中国经济真正的自身活力和竞争的优势、创新的动力。这样一来,市场活力就会更好地调动起来。既能应付对外的欧债危机,美国经济未走出低谷,又能应付对内的投资无效和需求的无序。中国应该由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供给管理就要放开竞争、打破垄断、肯定市场。供给就是在创造需求,只有供给才能带来增长。我觉得这是核心。

现代快报: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民生银行行长不好意思公布利润”,这条新闻有很高的关注度,你怎么看?

惠双民:现在为什么出现民间资本的高利贷以及民间的借贷疯狂?还是因为资本市场没放开。我认为所有民间资本的疯狂并不是民间资本的疯狂,而是金融业垄断的银行业的疯狂,不少银行内部的职工把国家的钱拿出来疯狂地借贷,或者说先攒存,后高贷。

快报记者 刘方志

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

不能对“宜黄复出”的民意反弹掉以轻心

据昨日新华社《中国网事》报道,有关方面已经证实,宜黄前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双双复出分别任新职。消息既出,群议汹汹,作为社会情绪的表皮,舆论表现出愤怒、无奈、失望等诸种负面情绪。让人不解的是,影响如此恶劣的宜黄拆迁,当事人居然安然过关。让人更不解的是,面对民意的强烈反弹和舆论的严正质疑,江西有关方面安之若素,无动于衷。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态度。

官员带病复出,往往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免职本身就不合理,为了搪塞、敷衍公共舆论,便要部分当事官员顶雷,先免职再说,但这免职既不能让当事人服气,也不公平。这样的免职,如果不给人家以出路,迟早会产生不良后果;二是免职本身就是轻纵,因为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

且为处同一战壕里的利益共同体,所以下不了狠手,免职不过是保护官员不受刑律处罚的一种权宜之计,这样的免职,假以时日复出也就不奇怪了。

当然,人犯了错误要有机制允许他改正错误,官员也一样。因为主客观原因,导致失误、出了点问题,也不能一棍子打死,给犯错误的官员以制度出口,这本身就意味着公平。但是,这样的复出,必须依法而行,在确实分清责任,并且进行相应的问责,在官员有了切实的改正事实之后,按程序复出。如果遇到舆论质疑,有关任命机关必须公开给民众以合理的交代。

现在,舆论之所以对官员复出反弹强烈,恰恰说明,在复出的理由和程序方面,存在瑕疵,而这,正是需要有关部门着力加以改进的地方。怎么改?至少需

要做到两点:

其一,提高官员复出的能见度。问责之后官员的复出,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在信息公开和监督意识日益高涨的今天,不是低调和悄悄就能瞒得了公众的。事实上,也不应该瞒着公众:公众不是正义的对立面,舆论的质疑有可能带着惯性的情绪,也有可能信息不对称的结果。要想减缓舆论质疑的震荡波,有策略性的回避是可以的,但这不能成为公开官员复出正当理由的挡箭牌。如果不提高官员复出的能见度,不给社会公众详细解释问责官员复出的合法性,以期取得公众的谅解、理解和支持,则会给民众寄予厚望的问责制带来诚信危机,因而进一步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其二,正视舆论质疑的正当性。舆论之所以质疑,是因为长

期以来,官员不正当复出的事情此起彼伏,公众郁积的对虚假问责的负面情绪无法排解。对复出的官员的盯住不放,与其说是公众的质疑偏执,还不如说是对权力习惯性警惕的警惕。漠视这种广泛性的质疑,相关方面没有任何理由。即便所有的程序都无懈可击,就认为这种正当性可以秘而不宣,或者以为不必被“舆论牵着鼻子走”,那就太托大了。傲慢的结果,只能是干群对立的加剧。这样的隔膜,对和谐社会的建设又有何益?

一味回避、漠视民意的汹涌,其结果只能是“小事拖大、大事托炸”,这样的恶例我们已经见得太多了。所以,我们期待江西有关方面迅速行动起来,而不只会捏着拖字诀和躲字诀,来伤害公众对公权诚信日渐稀薄的信任。(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副教授)

今日视点

警方施援农民工讨薪并非“多管闲事”

重庆南岸区公安分局透露,为依法帮助农民工追讨被拖欠的薪水,重庆南岸区警方成立了全市首个农民工薪法律救助中心,和劳动、信访等职能部门联合办公,为农民工讨薪,截至目前已经为农民工追回欠薪过百万元。(12月5日《京华时报》)

由警方牵头依法帮助农民工追讨被拖欠的薪水,这在全国也不多见,而变坐等受理农民工因讨薪引发治安刑事案件到超前时出手相助,更是化被动为主动的积极为民之举。

近年来农民工被恶意欠薪事件呈有增无减、愈演愈烈之势,已经上升为农民工问题的“头号杀手”。农民工呢?为能够讨回自己的血汗钱,他们可谓用尽了所有的办法,有人选择了暴力讨薪,最终受害者反倒成了害人者;更多的是处于无奈而又漫长的等待之中,其中也不乏跳楼讨薪、裸体讨薪、跪求讨薪等悲剧性的事件。

许多恶意欠薪逃匿者已经上升到违法犯罪行为,除了劳动部门要真正守土有责、严格执法外,我们更期待由政府出面,调动公安、工商、税务等多部门资源,主动出击,为农民工提供相应的服务,有利于遏制和降低恶意欠薪行为的发生,即便这样的情形发生了,对社会的风险和危害也会压缩在相对较小的范围之内,不需要等到“人声鼎沸”了再“亡羊补牢”。

警方牵头帮助农民工讨薪,作为一种过渡性的辅助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劳动执法力量薄弱的现状,更重要的是可以促使人们从法治的角度,去看待和考量欠薪问题,将解决欠薪问题与建立健全工资保证金制度有机结合起来,让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切实得到保障。

江苏 周稀银

热点纵论

听证会屡现“假民意”源自决策不自信

据12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去年底通过的长沙市水价调整方案,在听证会上被听证代表以绝对多数赞成。今年8月份,长沙理工大学学生社团“大禹之子”通过登门拜访、发放调查问卷等形式调查发现,对调价的意见与听证会上的信息相左,大部分市民表示对政府提出的阶梯式水价不了解;对政府拟定的水价,有一半以上认为偏高。

据报道,长沙市民有关水价调整的民意在听证会上可能“被代表”,今年9月,湖南广电总台下辖的某电视频道报道了一批

历年来“踊跃”参与各大听证会的“听证专业户”。一位参加过几次听证会的匿名人士透露,长沙存在着一个“专门听证”的群体。听证专业户的产生,既有报名参加听证人员过少的原因,也存在组织者将不听招呼人员以合法手段排除在外的可能。

价格听证会不是调价决策会,更不是以票数多少论输赢。听证组织者追求听证涨价的高支持率,其实是对听证性质的误读,为证明决策合理性,不惜操控听证。组织听证会的目的是让各方代表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对

有关问题表达意见,使决策机关能在倾听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权衡利弊之后再作出决断。以常识看,调高公共服务价格的任何方案,基本都不可能赢得民意的高支持度,从这个角度看,长沙理工大学学生社团“大禹之子”调查得出的结论,当然也不能作为否定调价方案的证据。

组织价格听证会不仅在于统计几个代表支持涨价,几个代表反对涨价,更在于搭建一个平台让不同利益方共同分析研究调价方案是否科学合理。比如,就水价调价听证会看,组织听证

会更为重要的是让代表各方利益的人员,深入分析审核水价成本、调价原因等是否合理,防止通过欺骗等方式侵害公众利益,并通过政府网站、公共媒体等平台接受公众监督,建立更加多元的民意表达渠道,扩大民主决策,尽可能多地汲取民间智慧,最终寻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和解决方案的最大公约数。

只有解决了价格听证会“民意必须集中”的误区,听证组织者才能追求听证的本意,而不是迎合所谓的民意并为此不惜造假。山东 吴兰友